



生活在公園：台北市公園露宿者及政府管理

黃克先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近五年來，無家者（the homeless）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但他們的身影仍是孤獨的。這個社會對待他們的態度，從威權時期用軍警力量來懲戒被視為罪犯的遊民，到解嚴後以社政力量試圖拯救與規訓偏差的遊民，直到最近有越來越多具人權關懷及批判意識的學者及民間團體，嘗試扭轉一般大眾添加在遊民身上的污名，以平等及同理的角度與遊民交往。只是，無家者即使面孔從兇狠、可憐到變得清晰，身影仍然是十分孤獨的。攝影家、記者、非營利組織，及學者的作品中呈現的無家者，多半是形單影隻，看不見他們的社會關係。這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對內，另一是向外的社會關係。無家者雖不至像以往全然被視為疾病、罪惡的亂源，逐漸成為有故事、獨特觀察視角、藝術天份的人士，但他們內部的異質性卻從未被突顯，因此不同無家者之間建立的社會關係也不被看見，即使有愈來愈多研究者注意到他們的群聚性及互動頻繁（例如在公園、車站、社會局或等待供餐的教會內，可見彼此熟識的他們相互問候寒暄、交換生活資訊，不時也可見他們評價其他街友及自我評論街友這個群體的聲音，而在遭逢困難時，街友之間的互助也是度過難關的重要來源）。同時，無家者向外的社會關係也被窄化地認識，看不見他們的在地連結；無家者永遠是他現在居住地點的外來者、侵入者，與鄰近居民的關係也只有被排斥排除的這一種可能。

首先我們可探問，在公園之中的無家者內存在著哪些差異？能夠區分出幾種不同類型的無家者？我認為有三個因素特別值得觀察，如何影響無



至到萬華召開「行動市政會議」，並對外公布艋舺公園改造、市場改建和西區門戶等計畫成果，宣告龍山寺捷運地下街的文創區開幕。市長柯文哲說，歷經1年多努力，軸線正在翻轉，西區真的改變了。他並直言，翻轉首要困難就在遊民問題，而現今在各部會及里長合作下，已有顯著改善，預期將因此迎來可觀的觀光人潮，故在公園的地下一樓設置了旅客服務中心。未來政府單位、民意代表、開發商及社區中的特定力量，是否將針對聚集在艋舺公園周圍的大批無家者進行硬性或柔性的驅離、安置或管制，這是在接下來台北西區都市更新及觀光發展的浪潮中值得進一步觀察。按照以往研究指出，這種因觀光發展而欲將無家者驅至看不見的角落的作法，只會讓他們更難以「脫遊」而生活更加困難。

另外，無家者中也存在很豐富的「非正式網絡」的觀察，這可以看出無家者的在地鑲嵌，他們絕非孤離飄蕩的陌生人，而是持續與外界建立新連帶並互動的社會存在。這種非正式網絡可能包含三種面向：經濟性、社交性、宗教性。經濟性：在艋舺公園周邊，也存在著許多活絡的非正式經濟（例如樂透簽牌、賭博性下棋、小吃攤販、賣二手貨的「賊仔市」）以及商家；同時，也有許多希望找到廉價勞動力的工頭老闆會到這公園叫工。社交性：熟悉艋舺公園的學者、第一線社工員及地方文史工作者都知道，公園裡經常聚集了大量在大台北地區討生活的底層人士或年邁長者，在此聊天、做些休閒活動，跟無家者一同等待善心人士的捐獻。這些人與無家者之間經常會互相交換各種資訊及物資，同時天南地北地聊著自己的過去及世界大事。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對話裡，其實潛藏著積極的社交性，即「放下命運重擔」、「重定生命意義」的無目的性的社會交往形式。而把同在艋舺公園的各種人士一同納入考慮——包括其他有家但生活條件其實沒比無家者好多少的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幫派人士、性工作者。有助於



生活目的及生命意義：無家者在相對孤獨、低安全、物質匱乏、受歧視、缺乏主流社會所謂「希望」的環境中，如何找尋到生活目的及生命意義？他們是否寄望在彼世（other-worldly）的宗教性「補償」，還是民間信仰當中的某些理念、故事、論述協助他們整合出當下情境的深層意義？而這種宗教啟發的個人反省，又如何反映到他們日常倫理及人際互動之中？以上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問。